

DE LA

法国思想家新论

NATURE

还自然之魅

对生态运动的思考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著

庄晨燕 邱寅晨 译

于硕 校



DE LA

法国思想家新论

NATURE

陈彦 于硕 吉尔·德拉诺瓦 主编

还自然之魅

对生态运动的思考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著

庄晨燕 邱寅晨 译

于硕 校



© Éditions Métailié, Paris,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法)莫斯科维奇著;
庄晨燕,邱寅晨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

(法国思想家新论)

ISBN 7-108-02149-8

I. 论… II. ①莫… ②庄… ③邱… III. 生态学 -
研究 IV. Q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406 号

责任编辑 文 静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0.50 元

自然主义的激情宣言： 向生命说“是”

与读一般著作不同，您眼前的这本书像一部夹叙夹议的电影，不过，它不用画外音的形式，叙述者是当年的主人公，是历史的回顾者，又是当下的评论人，您跟随他进入一个反馈过程的阅读。电影主题是法国的生态运动历史，但不是线性的纪实，而是人的自然史中各种生命关系的梳理，是近代以来形成的理性至上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反思。作者向我们展示人类如何在科学进步的亢奋中，背叛自然，“征服”自然，直到将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死的机械的自然，并最终失去了养育我们的自然“乐园”。作为一部论文及访谈汇编，整部书的风格、结构随意，前后横跨 30 年的时间距离。不过 2002 年法文版出版时，作者将全部内容重新修订过，就是说对其中的内容或更新或肯定。您或许也像笔者一样发问，重温个人 30 年社会运动生涯的这位学者在修订时会想什么？是高瞻远瞩的满足？还是路漫漫其修远的艰难？他个人的回答是：“时光倥偬，再度体验。”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Serge Moscovici) 年近八旬, 现任法国社会科研中心社会心理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他在书中告诉我们他不肯在这里作理论, 而是讲“新石器时代”最后的故事, 始终充满着激情。但却不只是激情, 而是激情与理性相依为命的见证。被誉为欧洲社会心理学之父的这位思想大师, 当然三句话不离本行, 他的叙述背后所关照的仍然是他为之做出独特贡献的那些重大主题: “社会表征” (représentation sociale) 系统, 少数群体的社会影响 (influence sociale minoritaire), 集体选择和社会协调 (choix collectifs et consensus social) 的过程效应等。比如他关注科学知识、常识和社会表征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者将常识条理化为一个整体, 通过去背景化的过程, 与大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 而大众对于科学理论在内容的吸收上有着主动选择机制^①。所以, 他将本书视为自己“多重世界的诗化观念的散文版本”。

作者与我们相约, 一起对自然和存在其中的生命重新追寻, 因为“自然问题”是 21 世纪的“世纪问题”, 21 世纪人将以“还自然之魅”为己任。

一、“绿色阴谋”, 政治性生态, 生态政治

关照心理、历史、政治、环境的各种关系, 作者在三个历史时间点上往返移动, 向我们叙述了生态思想的萌生和生态运动的演进: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生态运动的萌芽, 90 年代生态运动的蓬勃发

^① S. 莫斯科维奇: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展，21 世纪初的自然问题与自然政治。

60 年代末生态运动的萌芽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是个制造思想地震的人。他以《绿色阴谋》为题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生态主义运动萌芽的象征。“绿色阴谋”旨在引起人们的自然意识，使其成为政治主题和社会科学对象，展开对现代科学机械化的批判。70 年代期间先后出版了他的自然三部曲：《论自然的人类历史》，《反自然的社会》和《驯化人与野性人》。批判矛头同时指向“抽象的社会主义”和“具体的自由主义”，因为以这二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社会都堂而皇之地耗尽资源，污染空气和水，毁灭物种，增产核能。而这一切都遵循着逻辑规则，体现了强人政治蔑视自然的成见和蛮横。他的思想如同猎人出发前的一声嘹亮的号角，令当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感到震动。为他作序的法国人类学新秀，他当年的学生迪比（P. Dibie）^①在法文版序中写到，他的著作让青年大学生及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激动万分。发表他的文章的《巨口》、《野人》等杂志，自 70 年代开始成为生态运动最具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喉舌。作者与编者当然同样遭到传统政党和专家们的批评和攻击。

莫斯科维奇在书中幽默地说，“绿色阴谋”成为人们用来吓唬年轻人，特别是小孩的妖怪。有趣的是生态运动的先驱们游戏人生

^① Pascal Dibie, 巴黎第七大学人类学讲师，当代音像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其在伯艮第乡村对“当代部落”习俗、礼仪、信仰的变迁的研究，对法国社会的深度演变提出独特的解说。著述极多，重要的有：《神圣部落》、《重新找回的村庄》、《观看的激情》、《汤经》、《卧室人类学》、《立足大地》、《跨文化交流人类学》等。

的心态，他们将计就计，反其道而用之：既然阴谋总是在黑夜中形成，那么就“光明正大地实现阴谋”。他们开怀庆祝，公然向冠冕堂皇的说教挑战：“我阴谋参加绿色运动”，“我们都是绿色阴谋家！”这些别出心裁的口号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令人耳目一新，造成社会动员效应。应当指出的是，绿色运动的萌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大趋势使然。著名的例子有罗马俱乐部的同期诞生，它所关注、研究的问题除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外，还有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这些“人类处境”的重大问题。

90 年代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

始于挪威总理布伦特兰（Brundtlan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 80 年代以来，已广为人知。它产生于下述认识：16 世纪从欧洲开始，并于 19 世纪以后扩展到全世界的经济与工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对未来不作长期观望，不对后代的生存提供保障。它急功近利，因而造成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对地球环境的灾难意识越来越强烈，各种著述中最犀利的是对技术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批判，莫斯科维奇把后者称为“最后的原教旨主义”。他在书中解释到，世界各国间的平衡，所谓的“和平共处”，竟要由可能会向我们地球释放宇宙能量的核武库来保证，这就使得技术专家们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变成评判历史的法官。技术主义甚嚣尘上，技术官僚体制叠床架屋，国际层面的核武谈判桌前穿梭往来的正是那些“有技术无视野”的专家。再加上那些无视野也无技术的政党官员，用韦伯的话说，“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在蝇营狗苟地攒动，进而使辉煌的科技发明走向悖论，把我们

的社会盲目引向“奋发图强”的“死亡文化”。

莫斯科维奇始终认为，最科学、最理性的宇宙核能量是灭绝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最成熟、最危险的手段。正是那些专家们支配着各种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秘密实验室，它们如纳粹时代的集中营一样阴森恐怖。然而需要反抗的不是这些专家替罪羊，而是国家的技术官僚体制。享有特权的这一体制以捍卫国家富强为名牺牲百姓的利益，以增长的量的指数代替生命的质的尺度，以获得未来更大的自由取消当下的自由。一切牺牲都依此为依据，而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这种策略。法国人有句俗话，叫“明天免费剃头”，意指永远不会兑现的允诺。

技术官僚们似乎想走一条貌似务实的“学术”道路。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设计一种被称为“学”（logie）的东西，一种“摆脱蒙昧、告别天真，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科学——生态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维奇对绿党进行了批评，因为它在宣传环境保护中陷入了技术主义的盲目，将自然生态“技术化为环境”。在希腊语中，生态指的是生存居所（oikos）与持家之道，而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指的只是外部环境。其中的偷梁换柱在于，将一种包括伦理、家政在内的自然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具性的环境外壳。这样一来，环境就成为达尔文所说的，只是“独立于人类及其他物种之外”的存在。而生态运动的目标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它不只是要求纯净的空气或是反对污染，还意味着民众对自己生存空间和方式的选择，参与促成政治上的替代方案。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是个率性而行的人，在生态运动中大声疾

呼要建立一种“生命文化”。少数人的激情和思想影响在此期间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 (*masse critique*)，转化成大众的觉悟，科学的百年黄粱梦被惊醒了。作者充满感情地向我们描述道：“每个人身上都涌动着对自由的渴望，像向日葵一样，寻找着太阳。”这里的太阳就是自然，它从启蒙运动时开始失宠、过时，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隐藏在一个常被用作贬义的词语背后。在世纪末的低迷情调和世界秩序的混乱中，自然像生态行军乐中的低音鼓，代表着寻找生命之源的脚步：“一点温暖，一个家，让备受威胁的人类生命在其中能够顽强地延续下去。”既然生态关乎我们的身家性命，就需要改变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专家式环保，自此出现了向生态运动政治化的过渡。

21 世纪初的自然问题与自然政治

人类的惰性体现在他的符号依赖性，需要在世界范围的各类战争中狂奔百年，才在人为划出的“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歇一下脚，看看周围，发现被当成征服对象的自然正在愤怒反抗，悲怆地用滚过大地之躯的各种灾难提醒我们它依然存在，生命有赖于它。如果人类不再有能力反抗自身的堕落、专权和麻木，那么就由自然革命来替天行道。只是再次现身的自然，伤痕累累，更像重返人间的冤魂。而不肯退出舞台的，是一个打败了自然但却灵魂空虚的机械世纪，是一个超越自然但却从上帝独断到理性专制的千年。自然的废墟上，各种延迟爆发的威胁正在急剧变成现实：核污染和食品致病，资源的匮乏和亡命徒们无节制的开发，大气失衡中的酷暑，生态失衡下的瘟疫（禽流感、“非典”、艾滋病），生命优生情结造

成的疯牛、转基因食品、克隆人……

“自然问题”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以后被重新提出的，克隆人的准出现进一步引起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危机感。“自然”，应当一字一板地把它念出，是的，人是否应当生而如是，自在天然？从此，“自然问题成为人们日常思考的主题”，是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类都共同关注的“惟一的问题”。生态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是跨文化的，它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世界的重心正从社会转向自然。”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是个信念坚定的乌托邦主义者。他肯定“自然问题”将是 21 世纪的“世纪问题”，应当进行自然问题的社会实验，并投入自然政治的实践。

二、科学的机械哲学和浪漫的自然哲学

莫斯科维奇在向我们讲述 30 年的生态主义运动史的同时，也向我们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梳理了整个近代认识论的两大线索，科学的机械哲学和浪漫的自然哲学。机械哲学希望将自然的一切力量，包括万有引力，都归结为机械力量；自然哲学则希望将各种现象和非机械力量统一到一个有机整体中。机械哲学试图复兴希腊原子论和几何学派的理论，自然哲学则要复兴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万物生息相通的无限本原观。机械哲学的先驱是伽利略，衣钵继承者是牛顿；浪漫哲学的先驱是斯宾诺莎，后起之秀中有歌德和谢林。今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需仰视而观之的科学泰斗伽利略却否认色香味的客观性，而伟大的力学和数学巨擘牛顿竟将视觉排除在外。歌德针对牛顿的缺欠，提出了“视觉世界”理论。他当时就批评指

出，在思想与感觉分离原则的作用下，自然和人类都丧失了本性。“现代物理学最严重的弊病是实验与人完全脱离，人们只承认人造仪器所展现出的自然，并声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限定和说明其效应”。稍后谢林在他的自然、同一和天启哲学三阶段中，将自然纳入自身发展的自在过程，将精神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这些机械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统统融入“世界永恒的灵魂中”。

我们太过容易地重复着“西方思维是二元对立的”一类成见，莫斯科维奇告诉我们，其实，即便是在这些活跃在思想者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之间，对立也远不是那么清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正在上演的是一出虚假的戏剧。科学家的牛顿也是一个神秘的法师，而歌德除了浪漫诗情和哲学，还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对自然历史的科学贡献极具价值。在与牛顿的论战中歌德必然失败，如同“狂飙运动”只能让“启蒙运动”出尽风头，因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但直到今天他的天才作品的光辉丝毫不减，“他恢复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在自然与人类之间重新建立了对话，即活的自然能够回答活的人类提出的各类问题”。鉴于350多年前的伽利略冤案于1984年才得到平反，我们大可不必与老先生计较前嫌。然而，他毕竟加入了机械理性对自然和艺术的排挤，以及对欧洲的“综合性的”、“东方式的”思维方式的封杀。浪漫主义与艺术、文学、诗歌以及被株连的比喻、民谚一并被扫入欧洲文明的角落。作者借用本雅明的话说，“如果说巴洛克风格意味着悲戚，那么浪漫主义则意味着忧郁”。他借题发挥，说现代科学和哲学是在土星星象下诞生的，一个世纪内将世界变成了忧郁的灰色。

至少，到了给浪漫主义自然哲学正名的时候了。可以说机械理性哲学高高在上的时代过去了，如果我们懂得充分估价现象学以来西方思想史发生的质的变化。浪漫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现出活的自然的方方面面，它复杂多变又受制于神秘秩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面是同人打交道的大善法师，取悦自然；另一面则是一个试图把自然、书籍、智能一起关进密室，把生命排除在外的学者。为了探寻人类和自然的终极目标，这位成就杰出的学者多年后居然同意与魔鬼梅菲斯特签约，以自己的灵魂换取他的帮助。在历经了爱欲、欢乐、苦难、神游各阶段体验之后，于生命最后的时刻，浮士德博士终于领悟到了存在的意义，那就是为生命和自由而战斗。完整的浮士德拥有双重人格，不正是我们自然普通人的化身？歌德属于我们的时代，因为他在 200 年前已经托浮士德告知我们：“自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惟一的问题。”

现在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智性的科学何以走向工具性的机械主义。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的是，与哲学相近的科学任务是发现自然的奥秘，对自然作出解释。科学在探索真理的同时，曾与宗教和世俗权力作过不懈的斗争，因此它同时也承担着解放自由的使命。然而，进步主义的 19 世纪改变了科学，在经历了一段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之后，科学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从快乐走向悲伤，从小写的科学走向大写的科学”，它自己摇身变成了现代宗教。像创世的上帝工作到了第七天，号角齐鸣，开始休息。而代行职守的是技术，二者之间的角色发生了逆转：技术主宰并塑造我们的世界，科

学不再探索自然的奥秘，而是霸道地要求理性牺牲世代相传的鲜活知识，只留下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

科学的口头禅是“支配”、“征服”，让自然像战败国一样屈从或干脆被消灭。支配需要建立一种秩序，而征服则是废除已建立了的秩序。科学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将自然花了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东西化为乌有，而类似的巨大浪费一直是大部分现代科学“奇迹”的基础。我们已习惯于对一切与自然相关的事物：自然人、自然物种、自然资源使用暴力。人们为新发明欢欣鼓舞，而那只是为了用科学技术来取代自然，或者说“将自然技术化”。“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学会了对自然的冷漠、蔑视或恐惧”，自然就这样被解除其巫魅。然而，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人类虽然赢得了几次战役，但却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

在去魅世界中，现代性的偏执将事实与价值推向绝对二分的极致。工具理性就此将精神性的一切价值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领域排除出去，并成功地用可计算的手段取代了不可度量的目的和论辩。“进步是一部只升不降的电梯，全自动、盲目向上，人们既不知如何走出去，也不知它会停在哪里。”我们都在现实的威胁下，但却还在不断地追求进步。进步的宿命论和计算无限度的增长正在把我们压垮。过去的人们在自然之中拥有一种目的，并且从自然那里继承了人类的天性，所以人能将目的拟人化，要么将人的能力和天性归结于神，受制于神；要么认为自然与人类一样，对人的目的能够判断，然后决定支持或反对。今天，机械科学使人丧失了目的，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对与错之于他不再具有判断意义。“此后我们就要以非个人化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再

考虑我们的命运，不再关注问题解决的意义本身。”我们变成缄默的集体，冷漠的人群。这让技术官僚占尽便宜，他们“不再与人们谈话，而是进行解释；不再努力说服，而是试图教育”。

莫斯科维奇指出，当社会中的事实与价值，社会群体或阶级间以二分法划界之后，社会本身也一分为二：一边是公共空间，只有事实才能得到承认；另一边是私人空间，而现代人已对其中的价值缺乏把握或被迫加以掩饰。这正是我们大多数社会中正在发生的精神分裂的现状。“这种无神无主、超越善恶的虚无理性还导致了另外一种更加奇怪的变化：除了机器和市场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

谈到机器，作者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在于用机器复制并实现人类的特质和技能，以“自动性”复制“有机性”，“将主动性和意向性的反应变为条件反射”，直到使生命机械化。这种自动性机器的最终实现，就是要淘汰它们所模仿的身体，即人类。大工业时代的自动化设计了“没有身体的机器”，当今超现代的自动化则在设计“没有器官的身体”，既然那些器官不再行使其原有的功能，例如让没有产仔的母牛产奶或通过人工授精生产小牛。没有器官的肌体与有器官的肌体貌似相同，同名异质。如同电视影像向我们展现的是世界的虚拟状态，但不再是世界真实。

最后，科学的变质还体现在它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僭权。过去大家都认为，科学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社会手中，比如先有了直流电和磁性的发明，然后才有在民用或军事工业中的运用。如今，社会提出建议，决定权到了科学手里。莫斯科维奇因此提醒我们：“过去，人们为科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

力。”科学不仅凌驾于公民之上，也远离了公开的辩论，“而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在多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科学与人类之间距离的拉大使热爱变成了恐惧。他强调说生态主义者是科学真正的朋友，他们当中的一些中坚正是科学家。他们所拒绝的只是盲目追随濒临失控的某种“进步”。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期待它获得新生，他们才努力抵制权力对它的侵蚀。要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我们“改变科学的生态，从而拥有生态的科学”。

三、恢复自然之魅：自然问题与自然政治

自然问题重新出现的背景是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出现了危机。莫斯科维奇引用海森堡的话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既没有伙伴也没有对手，需要面对的只是自己。”每一个人只要扪心自问，大概都看得到自己的同流合污：“受难的自然”可以归咎于进步，“但如果我们的道德没有给予支持，那么伤害自然的行径就不可能发生”。生态运动打破了社会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超越了机械理性的禁忌，重新赋予自然情感和自然理念以合法性。

生命的自然是感性的

幸亏我们还有这份自然情感，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见花落泪、望风伤情。如果人们对于这片生长着万物、绽放着光彩的大地没有感觉的话，如果没有面对满天星辰油然而生的宇宙神秘感的话，就不可能有生态运动。

自然是我们的感觉和思维直接可以触及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水草花虫、山川河海，是人类生息劳作的地球家园。四季更迭，日以

继夜，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自然。自然原本是一种朦胧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万物有灵，相息相通，白蛇方能与许仙结下姻缘。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和连接宇宙神灵的巫术法器、咒语祷告、天人感应、信仰体系，以此表达爱恋与仇恨、恐惧与渴望。巫魅的象征符号使巫魅的自然产生奇迹，信不信由您。

自然人的流离失所

莫斯科维奇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割断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这一过程表现为：

无属地化，人类群体在脱离居所和生产的同时，在世界各地散播并重组，陷入一种连续的反复，失去了与地球的接触，也失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为麻袋里相互挤压却毫无关系的土豆。

标准化，凭借完美主义者典型的无所顾忌和狂热精神，人类为自己建立起一种生命的典型或者所谓完美的标准，个体或群体再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只能或者必须实现这种被视作更好或者更高的标准。工具标准化，消费标准化，市场标准化，战争标准化……

超大化，如果说我们倾向于从产值、人口或资源的数量关系上来讨论自然问题，那是因为在拜物的语言中将具体的现象转化成空洞的抽象。个人消失在超巨型的都市并被迫抛弃自己的特性。机器人技术掩盖了超大化的事实。人们通过电脑传送最大量的信息，并将其传到最远的距离，结果却离开了周围有名有姓的个体和群体，陌生独处，甚至不复存在。

自然主义意识三阶段

“反应性自然主义”，太阳，蓝天，树木，鲜花，动物，在大地上运动着的和在天空中飞翔着的一切。包括“自然”这个词，归属自然的想法，对每一个人既是一个发现，又是对一种熟悉体验的重新认识。

“批判性自然主义”，由消极反应变成积极应对，思考变革的可能和方向，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但是它真正批判的对象是世界的去魅，正如韦伯所说的“从巫魅自然向理性经济的过渡”。

“积极性自然主义”目的在于彻底解放自然，将社会中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人是自然中积极的行动者，自然是人的创意的宝库。积极自然主义需要持续的政治激情，以公开动员民众，与他们一起进行思考，倡导一种历史自然观。莫斯科维奇建议我们花些时间去理解为什么在自然中存在着政治理念，因为这关系到确定政策、选择科学、集体行动。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主张科技研究等方面的决策应取决于一种自然的选择”。

自然政治

作者认为生态主义运动是30年来一场真正的认识论运动(mouvement épistémologique)，它创造了从政治性生态到生态政治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书中使用的“政治”一词，带有最基本的希腊原词的含义(politikos)，指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作者认为它是当今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自然政治不是“保护”而是“选